

文化中国行

《安徽文库》编纂出版工程已推出两批成果，成为备受瞩目的文化盛事

集江淮文脉大成
铸传世典籍精品

《安徽文库》成果亮相。本报通讯员 高斌 摄

■ 本报记者 张理想
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
祁海群

化“古文献”为“新华章”
展示安徽文化软实力

据初步统计，历代皖人文献著录约3.3万种，占全国古籍总量的8.3%；其中存世古籍约1.7万种，约占全国存世古籍总量的8.5%。浩瀚的安徽典籍哺育了世世代代江淮儿女，也汇入了浩如烟海的华夏古籍，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的历史标志。

新时代召唤着新的使命，古文献转化为今之华章。《安徽文库》规划出版约7000种、成书3000册，分六大部分：《书目编》《典籍编》《方志编》《要籍编》《研究编》《红色文献编》。

《安徽文库》收录范围怎样？按照地域范围，《安徽文库》以清康熙分省时之区划为基本地域界定范围，包括婺源、英山、盱眙、泗洪。按照时间范围，《安徽文库》中《书目编》《典籍编》《要籍编》《方志编》时限为先秦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；《红色文献编》时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始至1949年，《研究编》时限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。

黄德宽认为：“《安徽文库》在体例设计上系统全面，涵盖六编，既注重对历史文献的集成式整理，也注重对特色文献的深入挖掘，充分展现安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深厚的文化底蕴。”

于“集大成”中“再创新”
续写安徽文化新传承

2024年11月，《安徽文库》第一批成果100册图书正式出版，其中《方志编》84册、《要籍编》16册；2025

年12月，《安徽文库》第二批成果共计190种、94册图书正式出版，其中《典籍编》156种、64册，《方志编》34种、30册。

《典籍编》收录的古籍，在版本上力求足本、精本，且尽可能选用珍稀版本。《安徽文库》总主编诸伟奇介绍：“尤其是古籍中的宋元刊本，珍贵无比，《安徽文库》以影印加提要的形式公之于众，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。”

不少志书系首次影印出版，如第一次将民国《安徽通志稿》120册全部整理出版，其中《舆地考·水系》《民政考稿·灾振》《物产考稿》为首次问世，另外清写本《皖志快观前集》等10多种志书均为首次面世。安徽存世志书最早的北宋佚名《黄山图经》，定型志书存世最早的南宋《新安志》均被收录。

“《安徽文库》除了系统收录名家名著，还特别注重对稀见文献、版本的发掘整理出版，此举意义重大。”杜泽逊欣慰地说，许多珍本文献长期深藏馆阁，学者难得一见，《安徽文库》的整理出版使之重新进入大众视野，不仅可“慰吾贤于九泉”，更能为当代研究提供新的资料基础，真正实现“发潜德之幽光”。

以“学术心”铸“传世作”
彰显安徽文化新高度

以最高标准、最好质量，打造体现安徽特色、展现安徽气派、代表国家水准的一流文库和传世精品力作。《安徽文库》在编纂中，严格遵循学术研究规范、古籍整理规范和行业标准，涉古各编，皆广泛搜罗存藏于海内外的各种版本；所有影印本，对底本都实施目验，并逐页查核；无论是影印本还是排印本，都精心排比、精心校勘，务必精益求精，慎之又慎。

“实施《安徽文库》这一重大文化出版工程，是筑牢文化自信根基、厚

植文化底蕴的战略性举措。”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、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张国刚说，入选《安徽文库》的文献可划分为三个层次：其一，是以版本见长的本省藏书，即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献及其珍稀版本；其二，是作者与著作均属全国级别的名人名著，版本未必珍稀；其三，是安徽本土乡贤的著述，这类文献的作者与著作在全国范围内未必跻身一流，但兼具地方文献的珍贵价值与较高的思想水准、学术意义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安徽文库》对提要撰写提出了严格要求，《典籍编》《方志编》等规定每部书都要撰写提要。提要在客观著录该书的卷数、责任者、行款版式、原书序跋、批校题记及钤印等实物面貌，介绍作者（或编者）、刊刻者、批校题跋者的生平大要，简要叙述该书的内容、特点和价值，这是《安徽文库》编纂的一大难点，也是一大特色。

“古籍整理是一项考验功力、充满挑战的工作，需要整理者具备深厚的学养与极大的耐心。”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虞万里说，《安徽文库》汇聚了50余位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，为编纂质量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。他建议，依托《安徽文库》等重大文化工程，进一步探索建立针对古籍整理成果的科学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，做好人才梯队建设，以助力这项事业可持续发展。



龙虎尊。本报通讯员 王子涵 本报记者 李鹏 摄

打破“中原专属”，补齐淮河“缺环”——

台家寺遗址
重绘“青铜地图”

■ 本报通讯员 王子涵
本报记者 李鹏

暑假来临，阜阳市博物馆迎来众多青少年观众。在众多展品中，一件“镇馆之宝”格外吸睛。龙虎尊，这件出现在书本上的商代青铜重器，正是出土于阜南县朱寨镇润河湾畔的台家寺遗址。

作为全国第八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台家寺遗址曾入围2016年度“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终评，是现阶段淮河流域已发现的等级最高、保存最完整的商代聚落遗址。这里不仅出土了龙虎尊等惊世国宝，更让商代青铜文明长期被视为“中原专属”的传统认知得以改写。

从“意外发现”到“考古揭秘”

台家寺遗址进入学界视野，始于两次“意外”。1944年，当地村民首次在遗址西侧润河湾河道发现商代青铜器。1957年，当地农民在挖塘时，又意外挖出八件商代青铜重器，其中便有被誉为“中国十大青铜器”之一的青铜龙虎尊。

两次发现共出土龙虎尊、兽面纹尊、兽面纹尊、兽面纹尊等21件商代青铜重器，这批器物造型雄浑、纹饰精美，一经问世便震动考古界，也暗示着这片土地之下，可能隐藏着一处等级非凡的商代聚落。

为揭开遗址神秘面纱，2014年至2017年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，对台家寺遗址展开区域系统调查与局部发掘。随着发掘深入，一座布局严谨、功能完备的商代高等级聚落逐渐显现。

考古人员揭露出商代方形围沟、夯筑台基、大型宫殿建筑群以及“品字形”建筑等遗迹，出土陶器、陶范、玉器、青铜器、卜甲、原始瓷器、兽骨等大批遗物。其中，中心台墩面积近万平方米，北部建筑群均建于夯筑高台基上，三组单排多间横向单体建筑构成“前朝后寝”式的高等级宫殿布局。东部独特的“品字形”建筑，则是商代考古中的首次发现。通过区域系统调查，考古队确认该遗址是由一个大中心台墩、四个附属小台墩构成的高等级聚落。

从“铸铜作坊”到“文明版图”

此番发掘最引人瞩目的成果，当属淮河流域规模最大的铸铜作坊遗址的揭露。

考古队共发现商代铸铜遗物填埋坑28个，坑内堆积大量陶范、炉壁、炼渣等遗物，出土可复原陶范达1174块，涵盖鼎、尊、爵等高等级礼器的范模，可完整还原商代青铜冶炼、浇铸的工艺流程。

经微痕观察与工艺对比分析，专家确认，早年出土的龙虎尊、兽面纹尊等精美青铜重器，正是这座本地作坊的杰作。其中，龙虎尊采用复杂的块范拼接工艺浇铸，其高浮雕纹饰线条雄浑、繁缛精细，代表了商中晚期青铜铸造的顶尖水平。

这一发现有力证明，台家寺所在的江淮地区是当时中原以外的重要青铜铸造中心。

与台家寺约略同期的沿淮地区商文化遗址有颍上铜台子、霍邱绣鞋墩、六安众德寺等多处，但台家寺发现的方形围沟、宫殿建筑群、青铜冶铸作坊、青铜容器等所呈现的规模等级与工艺成就，是上述其他遗址所不具备的，因而在淮河流域众多遗址中有着最高的规模等级。

台家寺遗址商代墓葬形制、随葬器物组合均与安阳殷墟高度趋同，直接印证了该聚落是商王朝势力在东南方向开疆拓土、经略淮河流域而设置的一处具有军事重镇性质的高等级据点。

有研究者认为，商王朝设置台家寺聚落的时代动因，与开辟“江淮金道”以转输长江中下游地区富集的铜矿资源密切相关。

台家寺聚落族群的最高主宰者，源自商王室宗亲或商王分封的方国诸侯贵族，他们盘踞重镇，扼控江淮金道，凭借充裕的铜料资源与发达的冶铸技术，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，台家寺由此成为商代淮河流域的青铜文明中心。

从“考古成果”到“文旅线路”

台家寺遗址的发掘成果，填补了淮河流域商代考古的诸多缺环，为研究中原商文化南下淮河中下游地区、江淮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提供了实物支撑，为厘清商中晚期商文化与淮河流域、江淮地区本土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重要线索，也为观察、研究商代封建方国、“南土”疆域治理等提供了物证。

遗址揭露的铸铜手工业遗存及其承载的工艺流程，补充、完善了中国上古冶金技术谱系，有力佐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特征。

这一承载着厚重历史的遗址，如何提升知名度、深化文旅转化？有关专家建议，应构建全媒体宣传矩阵，联动国家博物馆、安徽博物院等举办实体联展与线上云展，制作考古科普影像，并联动凌家滩、双墩等国保单位，打造安徽早期文明品牌。

专家表示，在严守文物保护底线的前提下，可以规划建设考古遗址公园，复原宫殿与铸铜作坊场景并活化利用，设置考古研学与青铜器制作工艺体验区；深挖龙虎尊文化IP，开发文创产品，联动淮河生态、乡村文旅资源，打造复合型文旅线路，让千年遗址真正焕发活力。